

六

摧残教育 迫害知识分子

抗日战争图书馆藏书
www.krzzjn.com

痛苦的回忆

董春华

伪满时九台只有一所中学——九台国民高等学校，我就在那里读了三年书。在这段时间里，曾耳闻目睹一些令人永世难忘的悲惨事情。

1941年的春天，学校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学年，那时是春季始业的。外乡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到这里集中。一天，一个庄稼人打扮的老汉把一个个子矮矮的、圆脸庞、大眼睛、相貌清秀的年轻人送进了学生宿舍。大家都很热情地欢迎他——这位新来的伙伴。从攀谈中知道了他叫刘廷弼，家住西营城子，是新考取的。老汉是他的父亲。那时在乡间谁家要有一个中学生就很不简单了。因此，他年迈的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出息人，养老送终……老汉在临走时又嘱咐了儿子一番：不要想家，在这里好好念书，和同学们好好相处。然后，又转过身来对大家说：“你们对他要多看管一些，他年岁小，不懂事，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多担待一些。”大家被这种父子间的真挚的爱所深深地感动了。都点着头说：“那是一定！那是一定！”

开学上课了，第一堂是日文，那时日文是最主要的科目，由日本副校长堀岛来担任。提起堀岛来，学生没有不恨他的。因为他不把中国人当人看。他那副尊容也真逼人发笑。脸短得出奇，戴着一副大黑眼镜，几乎掩盖了他的整个脸。他一开门进来，刘廷弼这个乡下来的孩子一见这个怪物，便抑制不住自己，笑了起来。这一下子可闯了祸，堀岛把他从座位上拖出来，拳

打脚踢，摔倒在地上了。但还不放过，又上去一脚踢在肚子上，刘廷弼当时就起不来了。这时大伙把他抬回宿舍去，心里都很难过。但仍未想到这样纯朴、天真活潑的青年会因此离开人间。过了几天，病势加重了。只好给他父亲捎信来接他回家。刘老汉接信后当天就赶来了，仍是第一次来时的穿戴，只是那时的满面笑容换上了一脸哀愁。老汉泪流满面地把儿子抱在车上。同学们也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又隔了几天，不幸的噩耗传来了——刘廷弼死了。当时大家真都不敢相信，他确实死去了。

堀岛呢，当然仍旧当他的副校长。在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里，日本鬼子打死一两个中国人，还不是吃面条一样。

日文课真是讨人厌。一来记不住，二来不爱学。经过那个惨事以后，一上日文课大家就提心吊胆，等于“过关”。因为说不好，念不会，同学们没少挨打。这家伙还有一个绝户招儿：一个念不完，全班举桌子，一举就是一堂课。大家这可真是遭“洋”罪了。

堀岛调走了，同学们都乐坏了，李校长叫列队送他。大家心里想：送就送，给他送丧，祝他将来挨枪子儿。

接着调来的是女川副校长。这个家伙个头儿可真高，比平常人高一脑袋。他一脸狡诈气，穿着一条露屁股的呢子裤。因此学生们赠给他个外号“破裤子”。有人要问：“他那么穷吗？”不！他很有钱。那他为什么穿破裤子呢？这家伙有点像中国的“土地主”，是典型的“守财奴”。

他到任后，就调动了全校学生——不花一文的劳动力给他盖洋房、修浴池、种西红柿、种西瓜、种狗宝，给他剪羊毛、打毛衣。嘿！好家伙！贪婪的手伸向学校各个地方，好像要攫取这里的一切，唯恐有一星半点漏下似的。

干活时，他亲自监工。谁要是干得慢点儿，他就连打带骂。

大家也有招儿对付他：他来了大家就像满劲似的干起来，他走了大家就歇着，磨起“洋工”来。后来他发觉了，就发明了一种新的惩罚办法：跑圈儿。400米的大圈一跑就是10圈20圈的。

几个月后，他的洋房盖成了，他的菜果丰收了，他穿上了羊毛衣服。这完全是学生的血和泪呀。学生在这一学期课程耽误老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半年只讲两课满语（中文）。

“破裤子”苦心经营的“家业”没有享受多久就调走了。新来的是西塔副校长。他对学生的思想抓得可真狠。

他来的第一天，在朝会上介绍了他。他讲了一些话后，就把二年级的王宝山同学叫出来，叫他用日文背诵“诏书”。王宝山没背下来，被他一顿嘴巴打得满嘴流血。这就是他给我们的见面礼。以后，这家伙不管是集会时或走路时，他随时都可能叫你背“诏书”。有一次我班有一个同学没背下来，我们全班被罚在雪地里站了一堂课。很多同学手脚都冻坏了。

伪满绥中县小学教员的地位

李兆信

怎样才能当小学教员

伪满时期的社会是非常黑暗的。伪政府录用小学教员的办法是考试，不论新老教员，每年寒暑假都要进行一到两次考试，其目的不是为选拔适合小学教育的师资，更不是为了测验文化高低和业务能力，而仅仅是让掌握小学教育的官僚们借考试之机大发其财。考试录取的标准是礼物好坏和行贿多寡，谁送得

多而好谁就能被录用，而且能被分配到较好的学校，差一些的则仅能被录取而要到了偏僻的山区，至于那些两手空空的人，虽有较高的文化和工作能力，也必然名落孙山。至于看卷判分就完全是走形式了。所以，每逢寒暑假，一些新老小学教员的心里总要忐忑不安，新教员怕考不上，老教员怕失业，就得想尽一切办法做行贿送礼的准备。我在前卫南杨家屯小学当教员时，学校地临海边，秋季盛产著名的白眼鱼。我的同学耿崇山在王汉山屯中心校当教员，为了逢迎上级，托我代买25公斤白眼鱼，送给科长和督学。我的家境非常贫寒，有年老多病的父亲，又有妻子儿女，每月的工资维持不了最低生活水平，但为了不失业，平时就得在饥寒交迫的生活中再节衣缩食，忍受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痛苦，挤出钱来准备进贡。我是回族人，除送礼外，每年尔代节（回族的节日）还得借钱买油买面炸油香（回族高级食品，类似饼）送给官老爷们。为此，父亲着急上火，双目失明；爱人因饥饿而患胃溃疡（解放前相继死去），但那些官老爷却经常过着花天酒地的腐化生活。当时有个日本督学官，名叫泽村，外号大鬼头，女教员送的毛衣鞋袜也特别多，这个督学官把到手的礼物单放一个屋里，号称“泽村仓库”，这是当时人所共知的。在伪满时期想当一名小学教员，就必须满足那些贪官污吏的欲望。

小学教员进入农村

伪满农村小学校都掌握在当地土豪劣绅手里，另外还有一名专管学校的所谓学董，教员走进他们的一亩三分地，去留就得由他们说了算。所以，小学教员在县里闯过一关，还得闯第二关，教员进村必须先登门拜访那些土豪劣绅学董，事先备好礼物，到他们家中说些请关照的话，临走还得给小孩子钱。经

过谈话，他们感到人对心思、钱物两满意，才能把你留下。如应酬不到，他们会想法找词把你打发回去，使你不能立足。我师范毕业后初当教员时就知道农村有这种陋规，为了应酬，我父亲出五分利向张某借了20元钱。平时还得百般维持，年节都得馈送礼物。至于办婚丧大事以及孩生日娘满月，更得人钱一起上，否则教员位置就难稳固。我在白庙子小学当教员时，因当地地主徐某娶儿媳，前两天我回家结婚没上礼，以后又没补，就说我擅离职守，通过村长把我调出。在这个黑暗社会里当一名小学教员实在不易，拜了山神拜土地，也还得终日战战兢兢地工作。

农村学校惨状

伪满时期实行愚民政策，根本不重视小学教育。三五个屯才有一所小学校，而且很不像样子，校舍大都设在村头庙里，破烂不堪。多数小学只有一个班，搞复式教学，一班里一、二、三、四年级都有。教员走进学校，举目是墙倒屋塌的凄凉景象。教室里破桌子板凳残缺不全，甚至连一支粉笔都没有，因为微薄的一点办公费也已入了学董私囊。教室是个小黑洞，少窗缺门，办公室和宿舍更谈不到了，一张破书桌，一条破板凳，就是办公桌椅，想用纸张文具只有教员自己买。对面是锅台连着炕，厨房兼宿舍，炕上没席子，锅台没有锅，要吃没米，要烧没柴，无人过问。一个教员来到这样的学校，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好亲自下手修补教室，修理桌凳，到各处找学生，购买柴米。教员的工资由村长从县里领来转发，但往往发的不及时，或者村长放利了，或者他自己占用了，三五个月下不来，平时用钱只能临时借点。寒暑假给算清就算是好的了。我在前卫南老爷庙小学校当教员时，叶村长经常克扣教员工资。适值我父头部

患疮需钱治疗，向他再三要求也是置之不理，直到暑假也没算清。一年后调到白庙子小学，校舍如上所述，无法上课办公，住宿还没有炕。村长不理不睬，自己又无力修理，只有在这“五风楼”似的小屋里含泪忍受。

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那天起，东北的人民就当亡国奴，做牛做马。他们把中国人不当人看，伸手就打，张嘴就骂，汉奸走狗也狐假虎威，骑在人民头上做威做福。小学教员跟普通老百姓一样，任人欺凌，被侮辱打骂是常事。1938年初冬的一天，日本督学官原田到前卫优级小学视察，全学区所有小学教员100多人，都必须在早晨到前卫城迎接。当时我在距前卫城18华里的营守堡小学当教员，怕来不及，在前一天晚上就赶到王岗台中心校，次日早晨3点钟集体出发，要过宽4里的河床，河水没膝，又没有桥，只好涉刺骨凉水而过。到前卫城天尚未明，就在寒风中排队迎接督学官。迎到校后，开始检阅，当学生走过检阅台前向督学官敬礼时，在操场旁参观的教员没有敬礼，这个督学官大发雷霆，骂不绝口，并令重新敬礼。该校有两名女教员，一姓佟，一姓张，因病体弱，校长命其整理办公室，出来较迟。检阅结束后，督学官不问青红皂白，命其随从人员带她们绕场跑三周作为惩罚。每周有800米，又高低不平，跑完后两人脸色苍白，昏倒于地，经抢救才脱险。1939年寒假，教员在县城集训，我因步法走错，日人教官把我提出来单独练正步，前面有一积雪三尺深的大坑，日人教官不下口令不能停下，我只得向坑内走去，等从坑内爬出来时，两腿冻僵，但敢怒而不敢言。我有一个同学高宝德，因练习“建国棒”体操时面容带笑，被说成是不尊敬日人教官，拳打脚踢，鼻口流

血，真是有冤无处诉。每逢放寒暑假的前一两天，教育科派人到车站路口守候提前回家的教员，如被碰上，不是撤职就是严加处罚。由于从上至下不把小学教员当人看，以致群众也有个别人称小学教员是“教圈”、“孩子王”等。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家有三斗粮，不当孩子王。”在伪满当小学教员处处受压迫，受折磨，回忆起来真叫人寒心。

（摘自《续文史资料》第三辑）

伪满教师的非人生活

刘述先

伪满时期，扶余镇内各小学直接受着国民优级学校日本主事丁田、中心校主事井考、满蒙校主事大山的统治和奴役。丁田等人是县教育科日人大汇视学手下的爪牙，以丁田为首他们在各学校中横行霸道，任意殴打侮辱教师和学生。丁田总是阴沉着脸，像凶神伏位一样，有时他故意在盛夏的烈日下，召集各校教师训练走正步、拔慢步，不合乎他的心意，就是一阵责骂，走起来没头，拔起来不放。致使每个人累得满头大汗，又不敢擦。有时到哪个学校里，贼眉鼠眼地找茬子，说这个教师行礼不好，那个学生姿势不正，总是借故在师生面前侮辱或责骂一顿。有时还采取玩弄羞辱手段，你在生活习惯上难以接受的事情，硬带着你去做。记得曾有这样一段事。有一年7月间的一天，天气正是炎热，中心校受丁田之命，通知各中小学校长，要在中午到中心校集合。那时谁敢违背，都是提前去报到，大约有10余人，正在互相询问猜疑间，丁田哭丧着脸，从办公室

走了出来。这时有人喊了集合之后，他就当众说：“从今天起，每天要在中午集合，到江边洗澡，现在就脱去衣服，只准带上兜裆布（撒包特，当时每人卖给一个），不许携带其他服装，快！”然后就整队出发。大家听后，变毛变色，面面相觑，心想洗澡还可，带个兜裆布和赤身裸体有多大差别，不像个样，这怎么办呢？每个人心里既是为难，又是愤恨，但谁也不敢说啥。丁田站在旁边怒目监视，在此威逼之下只得脱去上下衣服，带上兜裆布，赤光光的实在难堪，个个低头丧气站在队里。在跑步奔向江边时，过往行人，无不停步而视，引以为辱。奴役生活，于此可见一斑。

伪满吉林师道训练所，是日本强盗训练本省教师、推行奴化教育、残害青年一代的大本营。当教师的不去受训，就有失业的危险，拒绝受训，当时就得被革职。为了维持生计，明知是受罪，谁能不去呢。记得第三期生训练开始时，日本教官采取各种强迫、残暴、侮辱等奴役手段，来对付受训人员。受训日期虽是半年，遭受的非人待遇，却是有口难诉。例如，每天三堂日语课，比啥都难熬，尤其不会日本话的，一入课堂就心神不安，他不管你日语程度高低一律对待。当教官偶不顺心时，不是当面斥骂，就是逐出课堂，隆冬数九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冻得你无处躲、无处藏。军事课更是难过的一关，铃声一响，都提心吊胆地跑到操场去集合，教官像凶煞神一样，站在你的面前，打几下，骂两声，那是很平常的事了，好些人腿上青一块、紫一块，都是军事课时被大皮马鞭抽的伤痕。每天早上要跑步，路程是3~10公里左右，不准请假，不准中途掉队。每周总有一至二次长途跑步，或是半夜三更的紧急集合（如由伪吉林省政府到哈达湾车站），有跟不上的，回来便是一顿斥骂，有时还罚集体晚开饭几小时。宿舍阴森森地像个冰房，晚上睡觉，就是

穿上皮袜子，戴上手套和皮帽子，早晨起来，被头还尽是冰霜，手脚冻得不顶用，只有盼到星期日跑到浴池去，算是得到暖和的地方。每天都是提心吊胆，心惊肉跳，说不上要过几个关口。恐怖生活，真是使人心神沮丧，难熬难过。有一件更野蛮更侮辱人的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就是在过旧历年时，训练所宣布放假5天，规定是旧历初四回校报到，初五上课，在初四晚上点名时，大约有六七人因故未能如期返校，第二天他们就陆续回来了，向值日教官述说晚到的理由。当时都准许报到，并未提出指责，以后就都照常上课了，谁也没有议论没有注意这个事。不料初六日晚上训练所的日本主事泽田和教官早间等人，把晚来的六七人，都叫到教官室。有些人很替他们担心，也随着悄悄地站在教官室窗外张望，晚到的几名同学，在教官室一边，垂手站立，几个鬼子教官怒冲冲的便骂起来，哇哇的什么混蛋，滚回去等等。有的同学详细说明晚回来的理由，泽田鬼子哪里肯听，横眉立眼的更加大骂起来，早间装腔作势，跟着溜缝，教官室真像阎罗殿一样，一阵拍桌声，一阵责骂声。情况虽很严重，都以为闹一气就完事了，哪想越来越厉害，后来泽田鬼子竟像虎扑食一样地站起来就要打人，停了一下，就恶狠狠的指着几个人叫他们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左右各打两下，不使劲，不响不快，就得重打。窗外人见此情景，又是愤恨，又是难过。六七个人在鬼子威逼之下，不得已自己打起自己来，有的脸已发红，有的口角流出血来。就这样，鬼子还是未消气，倒背手站在地当中，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忽又喊叫起来：“不行！你们要互相地打。”这几个人迟迟不动，鬼子又咬牙切齿地说：“快打，快打！”站在窗外的人，起先是窃窃私语，继而怒气填胸，目观这种残暴狠毒的情况，再不忍停留下去了。愤愤地各自走去，在宿舍里讲“受人奴役苦难言，何日才是出头年”。

以上只是几个片断回忆，伪满教师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看看这几方面情况，就可以从一斑而窥全貌了。

回忆伪满时期的教育生涯

孙加鹤

伪满时期，社会上流传着“四大硬”（即警察署、协和会、日本密子、宪兵队）和“四大软”（即青年塾、老教员、国兵密子、劳工团）之说。从这可以清楚地看出，伪满时期教师地位低下到何等地步，人民灵魂工程师的声望还不如日本密子，实际也确实如此。

延寿县的教育事业原来是比较落后的，但就是这样一偏僻落后的小县，仍然没有逃脱侵略者的魔爪。康德元年（1934年），侵略者为将教育事业纳入他们的轨道，就开始逐步向教育界安插日本人，首先派川岛岩珊公安校任主事，名义上是主事，实际上凌驾于正校长之上，掌管学校的一切大权。后来换为根本利德。成立中学时，先后派佐佐木东一、丸山正秋、寺井慎任副校长。后来又派寺田到县公署主管教育工作。日语教师多数由日本人担任，有吉岗基树、久保保、带刀武视等，他们虽是某校的日语教师，但不固定在一个学校，可以随意到别的学校去“视察”。他们一方面担任日语课程，另一方面，是侵略者在我教育界的代理人，执行监视中国教师言行的任务，对中国教师可以随意发号施令。如果发现或听到某个教师，甚至是学

生的言行有所谓可疑的迹象，便及时向其上级报告。伪满时期给公立小学派来一位日语教师，叫吉岗基树，表面看起来和蔼可亲，实际阴险毒辣，对其主子非常忠效。有一个星期天，他发现有些教师与外界人士集会聚谈，就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县参事官（副县长）铃木三藏。为此，铃木三藏和后来继任参事官的绪芳义门经常在星期日、节假日及晚饭后率其随从和翻译官，以“关心”教育和教师为名，到县一校、县女校找校长或教师、工友询问一些情况。有一次，他们又到县女校探听情况，正好碰上了我，同铃木三藏一起来的翻译官吴二问我：“这些老师晚饭后来校不？到校都干什么？”我没敢照本实发，应付说：“有三位老师是独身，寄宿在学校，也有时来一两位老师，都是来学校批作业的，没有干别的事情。”当时，我是县女校工友，他们见我年纪小，不敢撒谎，这事就算过去了。

更可恨的是，日本人将警务局警务指导官中牟田一家安置在县一校西侧的两间学校办公室居住，随时窥视教师的一举一动，掌握知识分子的动向。在这种环境包围下，教师不敢有一点过分行为，甚至连一些心里话都不敢说，否则随时随地都会惹来麻烦，遭到意外和不幸。

日本侵略者在组织上统治我教育界之后，紧接着通过各种宣传形式，加紧奴化宣传教育。他们到处张贴标语，什么“日满一心一德”，“皇帝陛下万岁”，“莫谈国事、守口如瓶”等，还派出宣抚班，带着电影机到各地巡回宣讲演出，宣扬其侵略战争的合法化。每当日本人打胜仗时和满洲国建国纪念日，都搞大型庆祝活动，以宣扬其“赫赫战果”，并由特务股拟出题目，如“新加坡改称昭南岛的意义是什么？”、“试论皇军南进政策的意义”、“如何强化北边镇护”等，让教师讨论之后写出思想认识和感想，然后交警务科特务审查上报，以掌握教师的思想动

态。搞得广大教师人人自危，如不按他们的要求去做，就要受到审查。

另外，侵略者还在伪满首都新京（长春）建立中央师道训练所，哈尔滨相应设立了地方师道训练所（以后并到哈师道学校），每年都要在各地抽一些青年教师去受训，我县每年被抽受训的大约有四到六名青年教师。受训教师除接受“建国精神”、“王道主义”等政治内容的教育之外，还要到王兆屯的伪军23团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伪满后期，县政府成立了特殊搜查班和思想矫正院。由特殊搜查班派出的便衣特务到处流窜，随时随地传讯老师、学生及有关人员，了解教师的思想活动状况，如有可疑迹象，立即上报特务机关，然后将可疑的教师送进思想矫正院进行审查。1944年冬，我与徐中山老师，因没有领学生给东子剥线麻（敌人掠夺的战略物资），被满脸酒气的伪副县长八岛正雄叫到警察派出所当面斥责，说我们思想不良，对其“圣战”没有认识，拍桌子、破口大骂，并要李警务股长马上逮捕我们。幸而一名伪职员，找八岛正雄有事急去，我们才幸免去思想矫正院审查处理。

阮书声老师毕业于吉林师范学校，先后在县一校和县女校任过教，教学非常认真，对学生的思想、学习、生活等各方面都极为关心，深受学生的爱戴。阮老师在吉林学习时曾与朱殿超同志搞过抗日活动，朱殿超在吉林被日本特务逮捕，阮老师也暴露。延寿特务机关得知这一情况后，由特务科派一名警尉多次传讯阮书声老师，胁迫他交待问题。阮老师借酒痛骂日本鬼子。1940年3月1日晚，正当县公署为伪满建国节召开提灯庆祝大会时，阮老师悲痛欲绝，酒后投井自杀。此事发生之后，广大教师受到极大震动，教师个人筹资为阮老师送葬。敌伪当局

害怕师生起来斗争，便贼喊捉贼，假意派出人员，到教师中了解阮老师死因，以掩人耳目，此后就不了了之了。阮老师死后留下弱妻和幼小儿女，过着极度贫困的生活，而广大教师则敢怒不敢言。

二

在日本人面前，中国教师是低人一等的，作为一般教师的日本人对中国教师也有无限的权力，轻则训斥、侮辱，重则开除。公安小学主事川岛，经常到日本酒店“入船楼”或朝鲜酒店饮花酒、伴艺妓，胡作非为，不务正业。自己的行为不轨，然而却以统治者自居，趾高气扬，横行霸道，无论何时，师生见到他必先问好，否则就视为大逆不道。该校的康世璐老师就不理他这一套，因此后来找茬打了康老师。特别是女教师，在这些日本人手下遭遇就更惨了。公安小学有一个姓杨的女教师，因年轻貌美，被带刀武视这个无耻之徒所看中，几次意欲调戏都遭到反对，所以怀恨在心，到学期末人事调动时，只他一句话就把杨老师调到偏僻的农村，杨老师因有许多困难无法到那里工作，被迫于1940年离职回辽宁老家。遭遇最悲惨的算是公安校的费老师，县公署的一个日本翻译把她玷污后，又卖到了外地妓女院，沦落为娼妓。

在那时，教师不但要受官府的压力，还要受有权有势之人的气。我们这些教师在有权有势的学生家长眼中，只不过是他们雇用的佣人罢了，经常有些学生的家长到学校来纠缠老师、质问老师为什么没有把他们的孩子教好。记得有一次公安小学召开父兄会（也就是家长会），一位有权势的家长不顾影响，仗势欺人，当面质问其子女的班主任周老师说：“周老师教我家孩子两年多，可算术的加减法都不会，只识十几个字，连自己的名

字都不会写。这半年，我们请了一个私塾先生，虽只有六个月的工夫，可算术不仅学会了加减法，而且还学会了乘除法，字也识了八九百，《三字经》、《百家姓》和许多唐诗宋词都会背了，将学生送到你们这个学校能学出什么名堂呢？”这种不顾客观事实的恶毒攻击，使老师们非常难堪。特别是高年级教师更难当，一些家长带着威胁的口气和老师谈：我这个孩子就算交给你了，他念好念坏，毕业能不能考上国高就在于你了！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教师的心情总是忐忑不安、如履薄冰。

那时教师不但被侵略者当作他们实现奴化教育的工具，而且往往还充当劳工的角色，为其霸占我国领土服苦役。

当时各个学校都有不少农田，从春播到秋收的一切劳动都得教师领头去干。另外还被调去修建城西的两个飞机场和所谓的忠灵塔灵园。此外还要派一部分教师到新京为傀儡皇帝修建皇宫和建国神庙。1942年，我县30多名青年教师被调到一面坡国民高等学校参加所谓的“中坚教师暑期训练班”，那次参加训练班的教师总共有2000多人，我就是其中之一。训练班除政治教育外还要参加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每天长达16小时。这些教师原来体质就很差，加上训练班的伙食不好，不少教师都染上了流行性疾病（毒性痢疾、霍乱……），我也未能逃过这场灾难。侵略者连最起码的人道主义都不讲，不但患病不给治疗，就是因公受伤也无人过问。

三

伪满时期，作为“穷教书”的教师只能靠微薄的工资来维持生活，其标准之低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如此，也不能得到保障，不是今天被迫为日本侵略战争捐献，就是明天被无理克扣、拖欠，致使相当一部分教师家庭生活朝不保夕。

那时小学分初小和高小。初、高小教师的工资差别是4元钱，即初小26元，高小30元。但是，由于教师多学校少，有的只好两人顶一个人来教一门课，这样工资也只能挣半个人的，那就是十四五元钱。这点工资只能维持教师本人的生活，而家人妻小就无着落了。

到伪满中后期，日伪当局为紧张的战争需要，经常向师生强制缴纳战时物资，如：金属、猪肉、线麻等，还强迫教师购买“战时债券”。

更为可恨的是“九·一八”事变初，拖欠教师的薪饷的情况经常发生，后来才搞清楚，拖欠教师的这些工资都被当时主管县财政的曹督办从中侵吞了。他用这笔钱为其儿孙购买了大量的花岗石条，以作为其万年后的基业。后来，这位曹督办逃亡到阿城去了。这事件激起了全体教师的义愤，引起了“闹薪”事件。尽管如此，官家仍然不管，最终只由曹督办的代理人用他所开烧锅的水酒代其抵债，结果，几个月的薪水只换了15公斤白酒。

广大教师长期在艰难困苦的生活中煎熬，拖垮了身子，有的默默地死去了；有的为了维持妻儿老小的生活，被迫改行，甚至有的当了泥水匠。其实，我们这些教师的要求并不高，只要填饱肚子就行。杨景峰、张家驹等一些老师常说，“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能吃上几顿大煎饼就行了……”但就是这样的标准也达不到。

四

广大教师虽然生活在政治的高压下和极端贫困的生活之中，但他们并未屈服，民族感和爱国心在大部分教师心目中更加强烈。教师们在教学内容上作文章，采取多种办法，增强学

生的民族观念和培养学生的爱国思想。

孙友宏等音乐老师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尽量挑选健康的、具有能激发学生民族感情和爱国热情内容的歌曲教给学生唱，如《苏武牧羊》、《满江红》、《怀旧歌》、《天涯歌女》、李后主的《虞美人》等。

孙景略、林汉等满语老师的“文章”更多，他们在讲古文课时，借古喻今，对学生进行引导，使学生们热爱中华民族，憎恨入侵之敌。常讲的有文天祥的《正气歌》；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李密的《陈情表》；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桃花源记》；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杜甫的《三吏三别》等。同时，还常通过讲韩愈的《师说》、《进学》等一些古文篇章，潜移默化地告诉学生们，拯救祖国、报效祖国，要实现这一远大理想没有知识不行，所以要从小珍惜大好时光，努力学习，掌握真正的本领，为实现自己的抱负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讲到歌颂军国主义的课文时，则尽量发挥反面教材的作用。如高小满语课中《乃木希典》一课，是歌颂乃木效忠于日本明治天皇，在侵略战争中立功受勋，最后为明治天皇的逝世而自杀殉职的精神。教师们讲此课时，特别着重讲其描写在我辽宁金县战场一节：“……十里腥风新战场，征马不前人不语，金州城外立斜阳。”指出这个杀人魔王，为争己功，杀我无辜同胞，致使人血所染之腥风，远闻十里为之遥，欠下中国人民累累的血债，以激起学生们对侵略者的义愤。同时还告诉同学们，傀儡皇帝溥仪在访日时还到乃木墓前搞哀悼活动，指出汉奸和侵略者是一丘之貉，是民族的败类。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伪满时，尽管日本人很凶，但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一些教师勇敢地站出来，同他们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前面提到公安小学主事川岛岩因得不到康世

珊老师的恭维，总是想法找茬子整治康老师，可是后来被康老师教训了一顿。那一次是川岛特意检查康老师的教案，结果康老师没作。川岛找到了借口，大肆指责康老师，康老师不服，川岛气急败坏，举手要打康老师，因多数老师都在办公室，而没打起来。从此川岛更加怀恨在心。不久的一天，康老师晚上值宿，当时，我是管理学生宿舍的，又是单身，就在学校住，所以，值宿的事都是由我来代值，这一情况川岛是清楚的，平时也从来未管过。这天只是为了找康老师的茬，在晚上10点钟才突然来校检查，见康老师不在，即命学生把康老师找来，康老师来后，他边责问边伸手打康老师的嘴巴，还把康老师打了一个跟头。康老师站起来后，一怒之下，痛打了川岛，后来我领许多学生费了好大劲才将他们拉开。川岛的前额被打个大血包，吃了亏。这下可惹了大祸。第三天，康老师在班级里向学生作了声泪俱下的惜别讲话，告诉学生们要趁青年时期，在祖国危亡的关键时刻，努力学习，争取取得好成绩，以求抗战的早日胜利，否则当亡国奴之苦，是可惨的，最后，朗读了李商隐无题诗“相见时难别亦难”，以表示对同学的留恋之情。说罢挥泪而别，被迫逃往哈尔滨谋生去了。这一事件解了教师的心头之恨。

（摘自《延寿文史资料》）

五常县日伪摧残教育片断

王绥之

残暴的思想肃正

伪满康德6年（1939年）4月，日本侵略者在五常县实行“思想肃正”，首先着重文化教育部门。五常街第一警察署指导官中牟田，到五常街教育馆去检查书籍，发现奉天学生文范一书中，有“偶像的崇拜”几个字。中牟田发现后，认为这是毁谤伪满皇帝溥仪的言词，大发雷霆，立即把教育股长崔殿云逮捕。原教育馆的书籍，有一部分是五常县中学教员郭锡宾买的，因而郭锡宾有故意买反满抗日书籍的嫌疑，所以把郭锡宾也逮捕起来。继而把县立第一高级小学校长吕世瑞也逮捕起来，五常街女校校长徐化圃在监外听候处理。

审讯时着重在反满抗日和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无联系等。每日必审讯一次，每审必须严刑拷打。受刑最重的是崔殿云，有一次用柞木斧把打得崔殿云遍体鳞伤，把屎都拉裤子里。崔殿云哀告说上厕所回来再打，鬼子一声不响，仍怒气冲冲打个不停。后来裤子里边的大小便越来越多、越来越臭，鬼子才不打了。以后又有一次把崔殿云仰卧着用绳子绑在板凳上，用辣椒水向鼻子里灌，灌的时间长了，头发根都冒血了，肚子涨得像鼓一样，鬼子再用柞木斧把打肚子，使辣椒水再由口中吐出来，然后再灌，又把肚子灌大后才放下来。那时崔殿云已不能动弹了，用二人把他架回监去。该事件经过几个月的审讯和调查，未

得到真正证据，但是仍将崔殿云免职永不任用，将吕世瑞、郭锡宾、徐化圃免职，将郭锡宾、吕世瑞判为要视察人，每到过年过节时，集中到派出所监视两三日。

摧残教育

伪满康德7年（1940年），五常县中学农中班学生于国珍和同学金玉珠闲谈时说：“日满亲善为什么事事都是日本人说了算呢？”由金玉珠密报警务科特务股，即将于国珍逮捕严刑拷问反满抗日的情形及是哪个教员主使的，同时还引诱于国珍说：你说了不但对你没有关系，还赏给你国币。于国珍坚决不承认，残暴的日伪特务用筷子夹于国珍的手，几乎将于国珍的手指夹断。以后继续抓人，今天到校抓一名，明天抓两名，毫无事实和证据，任意严刑审讯，弄得人心惶恐。学生有的吓得不敢上课，教员吓得无心授业，学校当局也没有办法。事情延续两三个月，被逮捕审讯的学生有20多人。同时双城中学也发生同样的事情，情况更为严重。因此滨江省民生厅不得不出头交涉，才把事情平息下去。总之，伪满时教师没有一天无忧无虑地授业，学生心理担负的是思想犯，身上担负的是勤劳奉仕，没有一天能一心一意地去学习。因我也在五常县当过校长，崔殿云和郭锡宾又是我的同学，所以关于以上两件事情知道得较详细。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日本侵略者暗杀了王国华

雷音动

40年代初的朝阳凤仪女子师范，在全省遐尔闻名。凤仪女子师范的校长王国华，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教育界知名人士。王国华，字化远，1888年11月26日生于朝阳县王营子乡树林子村的一个贫苦蒙古族家庭里。他父亲王凤仪，是东北女子义学创办者。他暗中立志，将来一定把儿子国华培养成为有用之人。王国华8岁时，王凤仪便送他上私塾，由于他刻苦读书，成绩优异，1910年考入奉天两教师范学校。读书4年，每次考试成绩都名列前茅，毕业后回到朝阳。1917年在朝阳大阪义塾任教。1925年王国华受乡人推戴，在羊山成立义学，名“国华学校”，王国华任校长并兼任教学工作。1929年绥中邓尊楼聘请王国华创办“闾本学院”。1930年王国华又回到朝阳，在城内马公祠院内创办朝阳女子师范学校。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热河，王国华充任朝阳第三小学校长。1934年，王国华为承父志，在朝阳开办女子义学，名为“凤仪女子师范学校”，国华任校长。这所学校的教师，除聘请的之外，多是王氏家人执教。王国华的大半生从事义学教育，他办师范，培养师资，为发展朝阳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在辽西及东北大有名声。

日伪时期，他憎恨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奴化教育制度，更憎恨和反对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他具有中华民族的气节，他教学或讲演，都以《中庸》之刚毅精神贯穿始终，鼓励学生为民族独立而读书。他在官场从不穿协和服，更不贪图高官厚禄。

日伪当局提拔他当朝阳县教育局长，他坚决不去任职。从而惹怒了日本人，引起对他的注意。王国华的三子和四子在黄埔学校读书，他嘱咐儿子要为中华民族生存而读书，这更激怒了日本人，派特务侦察，意以“反满抗日”之罪名，加害于他两个儿子，三次被拘捕到朝阳日本宪兵队，均被富商孙寿堂先生设法保释。但是，王国华仍未摆脱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并要在他身上下毒手。

1942年初冬，王国华应邀到大连西岗子道德会讲演。在六天的讲演中，王国华把《中庸》思想之精华“智、仁、勇三达德”的民族正气，贯穿整个讲演中，听众受到启示，引起强烈的反响，点燃了振兴民族之火。这几天的讲演，使日本人不安，他们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要杀害王国华这位爱国的教育界著名人士。日本人设下圈套，“宴客贵宾”。王国华胸怀民族大义，出席了宴会，日本头面人物频频向王国华“敬酒”。王国华饮酒后，回到住所，因酒中有毒而发作，抢救医治无效而死，终年55岁。王国华的尸体运回朝阳，葬于大凌河东凤凰山下王凤仪之墓前。日本侵略者毒死王国华，是他们对朝阳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摘自《朝阳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日本宪兵在磐石县的一次大逮捕

张帆

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入东北后，为了达到它长期统治的目的，对中国人民采取残酷的镇压政策。磐石这个地方，在当时是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和磐石中心县委所在地，一些抗日的

团体组织，曾跟日伪进行过拼搏。因此，日伪认为磐石县是个“隐患”，教育界有“反满抗日”思想，不是“顺民”，所以恨之入骨。1934冬，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各地进行了一次对教员大逮捕的同时，对磐石的教员也进行了一次大逮捕。这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一次严重罪行。

1935年1月初的一天，天刚放亮，天空阴沉，刮着北风，下着清雪，天气很冷。一伙从吉林来的日本宪兵在磐石县城内出动了，带着一个翻译，跟着几个伪警察和一些伪团丁，有准备地对几个学校和一些教员家，进行大搜查，大逮捕。搜查完了逮捕15个人（其中一名农民），他们是：

磐石县教育局教育股长丛树春（字雨村）；

磐石县教育局县视学李文芳（字渔丹）；

磐石县初级中学校校长董吉昆（原名铭才，字大民。据说被捕时是教务主任）；

磐石县初级中学校训育主任王德本（字沫军）；

磐石县大成小学校校长于治舟（字润舫）；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校长邸省三（字绍曾）；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教员杨青山；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教员周利源（字建熙）；

磐石县福安小学校仆役崔仲仁；

磐石县天一女子小学校教员丛耀深（字伯瑜）；

磐石县烟筒山小学校教务主任王文富（在烟筒山被捕）；

磐石县烟筒山小学校教员刘兆田（在烟筒山被捕）；

吉林师范学校学生李渔放（在吉林被捕）；

吉林毓文中学校学生葛汝非（捕时地点不详）；

磐石县农民李文翰（给葛汝非送信被捕）。

他们不管到哪个学校或是哪位教员家，都是恶狠狠地骂着，

所有的箱柜，翻个底朝上，犄角旮旯，翻个遍。偶尔发现书信等物，如获至宝，以为找到线索了。就连福安校教员杨青山的一张毕业证书，也给拿走了。虽然什么东西也没搜出来，但搜查完了，却将这些人，一个一个地反绑起来，押到磐石日本宪兵队去。

这些被捕的人被推进拘留所后，面向墙跪着，低着头，不许说话，不许张望。鬼子还给看守一把竹剑，叫他相机行事，谁不老实就狠打。在这以前，葛汝非早就被抓进来了。他已经被打得遍体鳞伤。两只眼睛只露一条缝了，精神恍惚，一声不响地在地上趴着。被捕的人谁也不知怎么回事，个个提心吊胆，只好默默地等着。从清晨一直被关到上午9点多钟，日伪特务又把这些人三个一串连绑起来，绳子捆得紧紧的，推上汽车。鬼子凶狠地吆喝：“抬头的不行，看的不行，说话的不行，统统地趴下！”几个鬼子坐在这些人的身上，汽车就朝南开走了。谁也不知上哪儿去。当车经小南门外时，福安校工友崔仲仁，手举一顶皮帽子喊：“把这顶帽子交给邵校长（邵省三）！”鬼子似懂非懂地问道：“什么地干活？嗯！”伸手就把崔仲仁扯上车，并说：“你的也来吧。”教员杨青山刚要抬头，鬼子很快给他几洋刀背，打得他头昏眼花，再也不敢动了。

汽车飞快地开到火车站。下了汽车，又连推带搡地，关进了闷罐车棚里，锁上车门，不多一会，就朝吉林方向开走了。经过烟筒山站时车停了。原来，烟筒山小学的王文富、刘兆田也被抓来了，早就在车站等着呢。这些被抓的人下车小便后，又被带上车，车就开走了。

当天下午2点钟左右，到了吉林车站。站里站外布满了岗哨，一个个恶眉瞪眼，端着刺刀，戒备森严。其他旅客一个也没有，就连车站的职工，一个也看不见。日本宪兵端着刺刀向

这些人吆喝着：“快快的，快快的！”上了汽车又叫趴在汽车里，上边蒙上大苫布。谁要稍微一动，立刻遭到脚踢，枪托打。李文芳个子高，将苫布顶起来，鬼子骂了几句，踢了两脚。大家心里像揣个小兔子似的，暗想，不知要过多少道“鬼门关”。只好默默地蹲着，低低地弯着腰，坐在冰凉的车板上。

不多时，汽车停了。鬼子把苫布揭开，说：“统统地下！”只见周围站着些日伪警特，把这些人押上二楼。原来这地方就是吉林警察厅。

进去后，个个必须低头静坐，都面朝南，不许说话。隔了一会儿，就听走廊里哗啦哗啦地响，原来是一些凶手拉着铁镣铐进来，给每个被抓来的人扣上一副足有十多斤重的铁镣铐，唯恐扣不紧，凶手们又使劲地用锤子敲打着，震得脚脖子像折了似的，又麻又痛。接着又在每个人的背上用粉笔画上“1、2、3、4、5”阿拉伯号码，按号再分押到吉林市内五个警察署去。

寒冬腊月，这些被捕的人，从早到晚，整天连口水都没沾嘴，更不用说吃饭了。一个个连冻带饿浑身发抖，有气无力，昏昏沉沉，每个人都预感到，灾难即将临头。

天已经黑了下來，拘留所里只有一个小黄灯，暗暗地闪着微弱的光。过了很长时间，才把这些人又用汽车分别押送到外五个警察署去，只留下李渔放、葛汝非和王文富三人。认为李、葛二人是重犯，王文富是因为年轻，就没往外署押送，暂时也押在厅里。

第二天早8点多钟，又把这些人都集中在警察厅。

令人恐怖的严刑拷打开始了。“主审”是两个“警佐”，一个是日本人，一个是中国人。旁边还有五六个凶手，身上穿的是“武士道”服装，头上戴着战斗帽，每个凶手持着一根大镐把粗的硬木棒子，这棒子已经磨得光溜溜的了。凶手们像凶神

似地准备下手动刑。刑审室里还摆着各式各样的刑具，上大挂用的大粗绳子，下头带着大铁圈，在那悠悠荡荡地挂着，令人毛骨悚然。

先审问的是董大民，他身上挂着的木牌子上写“共党嫌疑犯”五个大字。这一定怀疑是共产党了。每个人都在寻思，“大祸”就要临到自己的头上，谁也别想逃出“虎口”。董大民一直被审问到下午4点多钟，凶手们把他抬回拘留所。只见他两只胳膊被打得一动不能动了，上大挂抻得就像两根木棒子似的直挺挺地垂着，他使尽全身力气，想站起，可怎么也站不起来，咬着牙，好久才爬到墙根趴下，一口一口地喘着气。身上被凉水浇得加上出的汗，就像被大雨淋过一样，鼻青脸肿，面无血色。他一直被连续刑审7天，身子实在不行了，可是鬼子还要继续刑审，当时的“法医”提出，身体需要恢复一下再审，刑审这才稍缓下来。可是董大民只剩一口气了。其余的人，除丛树春、周建熙二人外，和董大民所受的刑法基本一样，所有刑具用遍，所有刑法使尽。紧绑双手上大挂，一挂就是一个多钟头，放下来都是半昏半死的样子，手指伸出挺长。昏过去，就可劲用水管喷凉水，苏醒过来反说你装死，打得就更凶了。凶手们还往鼻孔、嘴里灌辣椒水；仰卧、俯卧压杠子，左右两边各站一个又粗又胖又有劲的凶手，使劲用两脚踩着、压着；用战刀背猛砍，每个人的脸上被打成血葫芦似的。个个死去活来，皮开肉绽，不等旧伤封口，接着又来重茬。每个人的棉袄、棉裤都打“开花”了，每个人的手脸，处处是伤疤、血痕。打得谁也没有活的心了，希望给个痛快，省得零受罪。王文富被打得实在受不了啦，把筷子削出尖来，要寻死。不料被看守看见了，说“要暴动”，反而又遭到毒打。在受刑审的人中，次数最多受刑最重的就数李渔放、葛汝非二人了。认为他二人是“重犯”，比董大

民受的罪更重。以后对李、葛二人，日本侵略者采用了“轮番”审的办法，审完李渔放，四个凶手抬回来，扔在地上，又马上将葛汝非拽出去。这样，三番二次轮流刑审，就连凶手都累出汗了，该有多么凶残。

审问工友崔仲仁：“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仆役。”“你的仆役来干什么？”打了个嘴巴，又揍两耳光子，“他妈的滚蛋！”然后就把他放了。真叫人啼笑皆非。

凡是受审的人，都受到逼问：“你与共产党有什么联系？”可是审到末了，谁也说不出来谁和共产党有过什么联系。还审问，参加过什么秘密组织；从事过什么抗日反满活动；另外有哪些人参加了这些组织，都是多大官，比如县长、局长等，都可以说，不要怕。在审问中采取威胁引诱手段，如，说了对你有好处，别人都承认了，你再不说，等杀头就晚了，等等。

这些被捕的人，一直关到1935年5月间，除李渔放、葛汝非二人外，其余都释放了。释放时对这些人说：“回去不许乱说，谁要透露出去，一定要杀头的。”叫每个人写一张悔过书，“保证以后老老实实，安分守己，不乱说乱动。”然后告诉这些人，自己想办法，求亲靠友，借点路费各回各家。就这样一场轰动全省，震惊人心的大逮捕结束了。

这些受害人回到磐石后，众亲友纷纷探望。福安校长邸省三不能认人了，并直说胡话：“哎呀！又来了。你们坏我干啥，无冤无仇……”好像得了精神病似的。没过几天，就去世了。县视学李文芳，原是一位非常健康的人，也因刑伤过重，到家不几天就去世了。县中学董大民被打成脑震荡，不能说话，行动困难。县中学训育主任王德本两个大拇指上大挂伸出半指长，只是皮肉连着，什么也不能干了。一年多以后，勉强用两只手夹粉笔写黑板字。大成校长于治舟，两只手不能端饭碗，不能使

筷子，不能解裤带。教育股长丛树春出来数月，仍旧两臂直垂，不能抬起，不能回弯，吃饭时把嘴凑到碗里吃。

这次大逮捕是吉林和磐石同一时间开始的。还有人说，这是全省日伪在各市县采取的统行动。磐石县学生李渔放，曾先后在吉林毓文中学、吉林师范学校念过书。他当时曾有过爱国和反满抗日的活动，他和当时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是师生关系。逮捕李光汉时，李渔放也被捕。葛汝非本是磐石县明城碾子沟人。曾在毓文中学念过书，抓李渔放时，在李的身上搜出葛的来信，据此，又去抓葛。葛的一位亲属闻信后，求一农民李文翰给葛去送信，遇上日伪特务，也就把这送信人抓去了。逮捕葛汝非时，又从他身上搜出他在磐石声称办学募捐的名单，日寇又参照这个名单和李渔放供出的名字，然后对磐石教员开始了这次血腥的大逮捕。

（摘自《吉林市文史资料》第六辑）

日伪对吉林教育界大屠杀见闻琐记

范广明

1935年，原敦化县私立敦东中学校校长张成之（字器瞻）在吉林市病故。张氏当时在吉林市粮米行街开设松柏药房，并在工业专科学校教英文课。由于他于1932年被吉林日本宪兵队逮捕后，拒绝了伪省署派他做伪扶余县长的命令而去经商，很受教育界的赞扬，他的葬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当时吉林市教育界爱国力量的一次大检阅。尤其是张氏之死恰恰是在伪吉林市警察厅进行第一次逮捕之后的不几天，这次被捕的教育界人士

有私立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榆树县人）、市立第五小学校长魏辅周、女师附小主任李禾村（原名李寿田）等人。前往张家吊唁的人们都怀着沉痛的心情，似乎是有意抬高这位当时在吉林市教育界并不是十分突出人物的身价，隆重地举办了葬仪。动员了相当广泛的各中学敦化籍学生参加了葬仪行列，女师、一中等校全体师生在灵柩经过时举行路祭。这种和当时政治气氛很不协调的行动，一方面集中地显示了吉林市教育界爱国力量的集结，用对张氏哀悼怀念的形式表现了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当权汉奸们的愤怒抗议；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的注意和怀疑。

我是在张成之逝世后两三天从敦化赶到吉林张家吊唁的。在张家我接触了吉林市教育界人士多人，并与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姜少石（本名德镛）谈到了爱国人士被捕事件。当时姜少石（是张氏治丧工作中最活跃的人物）还没有考虑危险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的关系很亲密（除了是同乡还是师生），我提醒了应认识事件的严重性，并考虑它和自己的关系，从而采取妥当的自处办法。他告诉我说：“这是由刘继瀛所引起的麻烦（刘曾在1932年在一师担任初中部训导员，这时已逃往北平）。他曾从吉林中国银行提取北平汇来的1万元款项，被日本宪兵队侦知。日本人由于他已逃往北平，没有捉到他。但是日本人认为这笔款子是用来做抗日活动经费的，所以就捉了这些人出气。”我说：“刘继瀛和你同在一个学校共事，又是北大同学，应该考虑一下事件和自己的关系。”他说：“看看我和他在一起照的相片是不是还没毁掉，这是很要紧的。”我又问他近来和一师校长邹海瀛的关系怎样。他很乐观，认为没有恶化的征兆。我说：“虞华（姜少石的堂兄）被邹设法撵走的事情你还没有忘记吧？从那时起我就看出你和邹陆涵（邹海瀛的

字)之间并没有半点交情,你以为在学校里很为他卖力气就能取得他的好感,这是很靠不住的。”姜少石听了我的话没有什么表示。我由于当时在敦化县东关小学教书,请假已到期,没有参加张成之的葬仪就回家去了。在行前还曾和姜少石夫人谈过这个问题,她主张要把一些有关政治的书籍烧掉。后来听说他们正在灶火坑烧书的时候,吉林市警察厅的鹰犬就来逮捕他了。这些人当场除了胡乱拣走了几本书以外,还从墙上挂的镜框后边搜出一张姜少石与刘继瀛等人合影的照片。这张照片据姜少石夫人后来告诉我说当时烧掉有关东西时没注意漏下来的。

姜少石被捕后关在吉林市船营街警察署,他的夫人曾去探望过一次,会面的地方是厕所,以后就见不着了。曾经有人在街上看见姜少石和许多被捕人士被特务装上卡车前往江南和北山,当时姜少石光着头,身穿水獭皮领大衣,用大衣领包着耳朵。特务们把他们押往江南和北山,是要他们招供在那里的开会地址。经过了几个月的严刑拷打之后,日本侵略者没有得到什么东西。有一天特务通知姜少石夫人,说姜少石已经病得垂危,家人可以前往省立医院服侍。姜少石夫人赶到医院时,见他已神智不清,语无伦次,始终没有说出一句清醒的话留给家人,就糊里糊涂地死去了。直到临咽气时特务们还在病床前边监视着。据日本医生宣布是死于“肠伤寒”。谁能相信日本侵略者的鬼话呢?日伪当局用尽了酷刑,什么也没有得着,终于不得不放弃按照常规把“政治犯”移交伪满司法部审讯判刑的程序,而采取了暗害的下策,企图以“犯人病故”的托词来逃避杀害优秀的中华爱国儿女的罪责。

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被关押在吉林市桦甸街警察署,日本侵略者把他单独地禁闭在传达室里边的一个小屋子里。不但与一般犯人隔离,而且与警察署里的一般“员工”不许接触。日

本侵略者在审讯中，对他使用了惨无人道的毒刑，“上大挂”使两只手臂的肩胛骨关节脱臼，后来关节部位腐烂生蛆，两臂和两手瘫痪残废，吃饭时只得把嘴伸到碗里，其惨状见者酸鼻。有一天傅兆麟先生因事路过该署传达室，见他满腮胡须、面如土色、精神恍惚，不忍卒睹。他最后也是在关押期染上“传染病”丧命的。

女师附小主任李禾村被关押在吉林市北山警察署，由于他机警圆滑，和看守人员处得较好，不但允许家人探监送来金钱、衣物和食品，而且能在看守陪伴监视之下到北山散步。但是毕竟不能逃脱日本侵略者安排的命运——身染“传染病”死去。

市立第五小学校长魏辅周和李光汉、李禾村、姜少石等人的死法一模一样。他们都被分别监禁在吉林市内的各个警察署里，怎么都得上了致命的“传染病”了呢？在病笃临终时期都神智不清，不能向家人诉说所遭受迫害的情况，含冤饮恨而死。日本侵略者所谓“传染病”“肠伤寒”云者，只是欲盖弥彰。

和姜少石同时被捕的还有吉林第一师范学校训育主任丛绍章，后被邹海瀛保释。

这两次逮捕都由伪吉林市警察厅长孙仁轩秉承其日本主子意旨亲自策划指挥的。孙仁轩是旅大人，曾毕业于旅顺师范学校，“九·一八”事变当时在长春满铁附属地当巡捕，是日本帝国主义豢养多年的走狗。在任伪吉林市警察厅长期间，即以迫害中小学教师 and 各界爱国人士而取宠于日本主子，一师校长邹海瀛和他是一丘之貉，表里为奸，也是这次事件幕后的参与者。吉林人民对这两个民族败类都恨之入骨，莫不盼望早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生啖其肉。光复后，两个家伙都在延吉市被人民政府镇压伏法。消息传来人心大快。但是如果和他们的叛国罪行来比较，还是死有余辜的。

据我所知，1935年前后，日本帝国主义在全东北境内进行了有计划的大规模逮捕，其锋芒就是指向各大中城市的中小学校教职员（当时大专学校还很少），先后在安东、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等城市都发生了类似的捕杀伪教育厅长、中小学校教职员的事件。日本侵略者认为教育界人士是抗日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镇压了他们就意味着镇压了这个运动。当时教育界中确有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领导和参加了抗日运动，而更多的人只是具有某些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并没有直接参加反满抗日活动。日本帝国主义镇压东北教育界人士是出于侵略者的政治需要，是对知识分子的任意宰割。

（摘自《吉林文史资料》第十七辑）

娄德镛被捕前后

娄德坤 于春海

娄德镛因“救国会案件”于1935年11月间，被日本特务逮捕，1936年4月被害致死。同时遇难的爱国人士有吉林毓文中学校长李光汉、教师李禾村。吉林市小学校长魏辅周等10余人。

娄德镛字少石。汉族，1905年生于吉林省敦化。祖父娄永和，农民，清末由山东随先人逃荒至黑龙江宁安镜泊湖，敦化设县后迁到敦化。父娄晴，行四。德镛幼年父母双亡，后过继给八叔娄照为嗣。1913年入敦化县两等小学校（即初等和高等小学），毕业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吉林省立第一中学。1922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预科。后值八叔患肺病，得到敦化亲友士绅的资助，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本科。此时与敦化

的富户梅家订亲，得到梅家的资助得以攻读大学。

在北京读书时，德镛常与进步人士接触，受到很大影响。尤其仰慕周恩来、马骏等革命家，曾与马骏晤面，得到马骏的照片。寒暑假回敦，每每谈起，绘声绘色地宣传周恩来、马骏的爱国活动。

1927年，德镛从北京大学法律系毕业，1928年被吉林省立五中聘为训育主任，同时兼授数学、英语、法律等科目。受到刘旨予、赵恭福二位校长的器重。

1932年初，伪满洲国成立，吉林省教育厅由日伪控制。荣孟枚任教育厅长，将吉林五中与吉林一师合并，由吉林东局子迁到八百垅大学校舍，定校名为吉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为邹海瀛，聘委德镛为教务主任，丛佩文为训育主任。第一师范校舍范围较大，中楼是办公室，下设图书馆；东楼为教学楼；西楼于1933年被吉林省警察大队占用。

1933年的一个夜里，警察大队把校舍四周围住，说有共产党传单。当时校长邹海瀛与其续弦李元淑回到长春度蜜月，所以由委德镛出面，动员师生员工检查图书，将易被敌人检查出问题的书一律烧毁。第二天，邹海瀛接到电报返回学校。不久，来了两个“电驴子”，上坐日本特务。日特下车，上楼少顷，由邹海瀛、丛佩文陪着走出，来到东侧教学楼；进入四十班。丛佩文点名，令张其义出来，当场戴上手铐。又点刘哲（现改名陆平）的名，不在，刘已逃走。然后到楼下带走一名学生，由邹海瀛亲自坐“电驴子”将这三名学生送到日本宪兵队。

1933年11月，日本殖民者开始在吉林市向教育界发动大逮捕，据说是由一师初中训育主任刘继瀛逃往北平而引起的。原来北平救国会发动海内外爱国人士捐款，支援关外义勇军，其中有一笔由北平汇到吉林的1万元，提款人是刘继瀛。刘继瀛听

到风声不好，取款后逃往北平。此消息被日本宪兵队得知。唯恐教育界参加抗日活动，故在教育界进行大逮捕。姜德镛与刘继瀛在北京时就有交往，后来又在一师同仁，经常在一起抨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所以德镛预感到自己可能被捕。便回家整理书籍。夜里正在烧毁书籍时，十余人破门而入，持枪将姜夫人及小孩统统围到屋地中心不许动。然后四处搜查。当看到灶间有烧书的白灰，便百般审问，此时门上边的大镜子被碰掉、打碎，露出后面垫镜子的相片，其中有一张是姜德镛与刘继瀛、姜幻三人的合影，于是日特根据这张照片逮捕了德镛。

德镛被捕后，家中不知他关押在何处。后传闻喂了狼狗、被日本人活埋了等等，一直无确切消息。旧历年将到，一天晚间，来了一位面戴口罩的人，自我介绍是看守，又说是姜先生叫来的，同时拿出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说德镛很想念孩子们，想吃饺子等等。姜夫人惊喜异常，马上包了三十几个饺子，托来者捎去。相隔月余，这个好心肠的看守又来了，说：“上次姜先生边吃饺子边说：‘真香！真香！算过年了，过年了！’”同时告诉姜夫人已安排好去见姜先生。那天晚上正赶上下雪，姜夫人随着看守到一个豆腐坊后院的厕所，等候不久，见一黑影移来，梅氏细看，正是德镛。只见他瘦得变了样，脸色青白，流着热泪。当时，夫妻俩抱头痛哭不已。片刻，德镛问起孩子们，并嘱咐梅氏设法营救。会面约五分钟，忍痛离去。

梅氏能与德镛会面，全亏看守安排，一方面因为看守是中国人有正义感，另一方面也由于梅氏花了钱，打通了他。此后得知了德镛被捕后的一些情况。

德镛被捕后，日本警特就没停地过堂，什么上大挂，剥去上衣毒打，用子弹头穿肋骨，受尽了酷刑。这当中，哈尔滨来的几个日本特务，更是惨无人道，竟将德镛的四肢打脱了臼。为

了加紧逼供，曾让德镛去辨认救国军开会、藏枪的地点。德镛明知已活不多久，因想见孩子们，便答应去江南，但要求从新开门白起推子胡同路过。日本侵略者答应了，便把德镛押上了汽车。当路过家门口时，几个孩子恰好在院里玩耍，听到汽车声，便跑了出来，竟意外地看见了日夜想念的爸爸。此时的德镛用大衣领子遮住了半边脸，为的是怕孩子们见到伤痕累累的脸而吓着他们。汽车开走了，所到之处，他又一言不发了，再次遭到毒打。

1936年4月初，日本侵略者见从他身上榨不出什么来，便对他下了毒手。在刑讯室里，日特端起一碗黑药汤，骗他饮下。德镛心里很清楚，这是毒药，奋力反抗不喝，被强行灌下。几小时后，姜德镛成了呆人，此后昏睡不起，神志不清。日本侵略者以伤寒为借口把他押送进吉林省立医院，由日本人院长专门“治疗”。

在医院后期，姜德镛已生命垂危，日伪当局通知家属去医院见面，梅氏与不满10岁的女儿桂环，来到医院。看守人员只许梅氏一人进屋。梅氏进去，见到德镛已奄奄一息，任凭呼唤已毫无反应。

过了两日，年仅32岁的姜德镛被日本侵略者害死了。后由堂兄姜德坤及亲属虞子新出面，把他装殓，埋葬于吉林北山义地。

本溪“思想犯”案亲历记

朱光壁

1936年初，日本侵略者为准备大举向中国关内侵略，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首先在本溪地区阴谋制造了一起“思想犯”案，以镇压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反满抗日活动。我当时作为“思想犯”，曾亲自经历了这一案件。

1935年（日伪统治东北时期）是我到本溪河沿中学任教的第二年。当时社会上流传着“明年（指1936年）是非常之年，世界上将有重大事件发生”的说法。据说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是根据国际间条约推定出来的。日本人都这样讲，甚至在公开集会上也这样讲。其实这是他们在大规模军事进攻中国关内前所制造的反动舆论。

1936年1月，正值学校放寒假，学校校长李如翔到校说：“日本人将进行大搜查。”因而让我们几名教员检查学校所有的图书、刊物，把当时所谓违反禁忌的人物图像及著作，“九·一八”事变前出版的地图、地理、历史、杂志等，付之一炬。为了保存《辞源》一类的工具书，也把其中的有关中日条约及战史的记载，逐项涂掉。同时，我也把家中保存的书籍和信件捞出大部分烧掉，以防不虞。果然，时隔不久，本溪“思想犯”案发，我被捕入狱。

1936年初（农历正月十六日）晚7时许，我正在家哄孩子玩，忽听敲门声甚急，开门后，立即有两名日军和两名伪特一拥而入。他们问清我的姓名后，立即搜身。然后两个人押我离

家，另两名留下搜查。我被用汽车押送到伪警察厅前时，又见被押上车一人，是当时本溪县第一小学校长崔庆桂（字芳秋），他是我的小学老师。我问他：“抓我们干什么？”他还很乐观地说：“大概找我们了解什么情况吧！”我深不以为然。一直把我们押送到日军守备队。在守备队的值班室，我见到另外被捕的3个人，他们是伪县教科社教股长王殿卿、伪县警务股长毛羽丰、伪县土地股长李如芝。这时，进来两名宪兵，拿走了我们的腰带、腿带和鞋带，把我们关押在一间房内，并且说：“我们奉上级命令监视你们，你们住在这里，不准互相交谈！”我们就这样被关押起来。房内无床，亦无桌椅，我们只能席地坐着或躺着，因为有宪兵的监视，也不能互相交谈。后来，两宪兵在外屋下起棋来，我们才能用在大腿上写字的办法，互相沟通思想代替说话。当时我想，我们几个，虽然素互相认识，但不来往，为什么被绑到一起来呢？可能是日本侵略者要进行恐怖性的镇压，先拿我们开刀了。在我们去厕所时，总有一名日军持着带刺刀的枪在身后看守。从日军士兵互相问答的谈话中听到了我们的各种罪名，有的说我们是“马贼”（日本侵略者对抗日队伍的污蔑称呼），有的说我们是反满抗日分子，有的说我们是准备向关内逃亡的人。总之是罪名不轻。这些越发证明了我的想法的正确。

我们被押在日军守备队的第二天，我校校长李如翔亦被抓来，和我们关押在一起，被关押的增至6人。第三天，崔庆桂被提走，下午送回。他说，“被提走后，押到日本宪兵队，并未堂审，但是听到了审讯室里有人被打的惨叫声，凄惨极了。”第四天崔又被提走，此后，一去没回。又过一天，王殿卿也被提走没回。这时，只剩下我们4人，都面壁枯坐，呆若木鸡，连用写字代替说话的精神都没有了，人人都感到大祸即将临头！

我是在被捕后的第六天提审堂讯的。由两名宪兵把我押送到宪兵队。刚一进入厅堂，就看见崔庆桂、王殿卿两个鼻青脸肿地在一旁站着，崔的额角上还带着几条渗血的伤痕。进审讯室后，见正面坐着3个日本审讯人员，中间的一个胖子是主审人（据说他是沈阳宪兵队派来的一个股长），还有一名翻译，另外是出出进进的几名宪兵。审讯开始时，主审者装扮出很客气的样子说：“这里有个案件，与你有关系。你必须讲老实话，把案情讲清，如能这样，就放你回去；不然，隐瞒不说实话，那就罪上加罪，后果就难说了。”接着讯问我的学历、职历。然后转入正题，问我参加过什么组织，是不是共产党员？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连一个共产党员也不认识。”还未等我说完，就被陪审者打了几个嘴巴。我坚持说：“我求学时期是张作霖时代，他极端反对共产党，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因而我未能接触到共产党。”他们不信，反复逼问，我也没说出一个，又挨了几个耳光。主审者又问：“你不是共产党，是不是国民党？”我答：“也不是，我什么党也未参加。”主审者暴跳起来，喊叫着说：“你念书时，国民党在东北已经公开，一般学生都参加了，你就没有参加？不说实话，给他上刑。”立刻上来两名宪兵，扒掉我的棉衣，把我捆在事先准备好的长条凳上仰卧；用绳子紧紧绑住头、臂、腰、腿，然后将绑我的长凳靠脚的一头垫起，使我身体与地面成30度角，头朝下，一个宪兵拎起一个装满冷水的太本壶，向我鼻孔倾灌起来；同时另两名宪兵用棍条狠狠抽打我的臂、腰和腿部，以为这样可以逼出供来。其实水灌到几分钟后，人就昏迷过去，对于一切痛苦已无知觉，这点，日本人是懂得的。他们灌凉水的办法是，把人灌昏迷后就停一会，等待苏醒过来后再灌。这样对我反复几次，把我折腾得无力再支持了，才停下来。用刑后，审讯者已走，只留一名日本曹长看

着我。我想：下一步审讯将怎样对付呢？我不是国民党，当然不能承认。但说不出几名国民党，也是不能过关的。经过考虑，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现居本溪或在东北其他市县的国民党员一定不能供出，至于逃入关内的，不妨供出几名，他们不在东北，是不会被日伪当局逮捕的。这样想好之后，又等了很久，审讯者回来了，继续审讯。我说：“我本身不是国民党员，但我认识的国民党员倒是有一些：马继益是沈阳师范校长，梅黄素是沈阳师范教导主任，孟祥符是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职员，刘克俭是本溪新民小学校长，杨遇秀是东大学生，高元利是本溪某小学校长。”我举出的人员，除高元利已死外，其余人都早已不在东北了。审讯者又问：“在本溪还有谁是国民党？”我说：“我回本溪不到二年，除前面举出者外，不知还有谁了。”时已将晚，第一次审讯结束，我被送入囚室。这时，精神紧张解除了，肉体上的伤痛发作起来，伸手一摸，臂、腰、腿多处已是皮开肉绽，肿得很高，伤处和衬衣贴在一起，身子不敢扭动，彻夜痛苦，未能睡觉。

天明，又对我进行了第二次审讯。问：“本溪有什么反满抗日组织，你参加过哪些活动？”答：“不知道有什么组织，我也没有参加什么活动。”这时，主审者又咆哮起来，叫喊道：“别人都承认了，你还顽固不说，给他上刑。”于是，两个宪兵过来又给我灌凉水，但时间较短就停止灌了，又继续审问，逼我承认，我仍然拒绝承认。这时，他们便取出一页纸说：“这不是你的组织和活动吗？”我一看，这页纸上写的是我所起草的“励行会”章程。原来在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侵略者为了消磨东北青年的志气，熄灭青年的爱国思想，在当时东北城市乡村设“管烟所”，置有女招待，公开贩卖鸦片。那时，青年中毒受害者甚多。我为教育青年，寄希望于青年救国救民，因此，在假

期草拟了这份章程，主要是教导学生不要吸食鸦片，以免沾染恶习。这种真情，当时当然不能全盘讲出。于是我解释说：“我校毕业生有些人因吸食鸦片而成为废人，辜负了国家的培育和希望，所以我想成立个‘励行会’，劝勉学生在校好好读书，毕业后洁身自爱，不染恶习，好好为国家服务。我写这页章程交给学校呈请上级批准后，再着手组织，现在这个草稿还未修改好呢！”他们看看章程的稿子也是这样写的，因而没再追问，结束了第二次审讯。此后我又被送回日本守备队原来的拘室中。此时，这里只剩下被拘的3个人，而且都经过了审讯，感到案情的严重，互相无语，面面相觑，也许是互存戒心的缘故吧！

两天之后，我又被第三次提审。这次审讯室内只有日本宪兵曹长和一名翻译。由翻译直接向我说：“今天下午，对一些罪重的人执行死刑。队长认为你还年轻（时我仅30岁），想给你一线生路，只要你把反满抗日的组织情况交代清楚，有悔过自新的诚意，队长将免去你的死罪，将来还可以释放你。如果你顽固到底，不肯交待，下午就把你们一同枪毙。”说完，就把纸笔放在桌上，让我写交待书或悔过书。我说：“没有的事，不能编造，我无法写。”他说：“你不肯交待，就写个遗嘱吧！你死后，保证能送到你的家里。”我寻思片刻，他催促我：“时间不多，要写就快写！”于是，我拿起笔含泪写道：“父母亲大人，我无事家居，祸从天降，狱中含冤，莫能自白。吾朱氏三世行善，得此恶果，良可浩叹，……”没写完，就不让写了，把我推进囚室。

囚室内，这时挤满了人，外面走廊和厅堂还站了不少人。这里虽然也有宪兵监视，但不太严。晚间，大家拥挤睡觉时可小声私语。因此，我知道了这里的囚犯有商店经理，有机关职员，最多的是小学教员。几天后，原在日本守备队拘押的6个人，除

崔庆桂之外，都囚禁到这里了。这里是夜间好过白天难熬。早饭一过，都提心吊胆地正襟危坐，等候呼名提审，即使提审的第一名不是自己，也得等候呼第二、第三名。在都屏息凝神待呼提审时，经常听到由审讯室传来的悲惨叫声，天天如此，空气异常紧张。宪兵队的刑讯极端残酷，有灌凉水、灌辣椒面、上大吊、打棒子、刮肋骨、用火烧等刑。有时两刑并用。被抓到这里受刑后放出去的绝无仅有。不仅政治犯被严刑拷打，就是一般小事，这里也用刑讯。如王殿卿就是因他的6岁小儿在课本第一课皇帝陛下的旁边写上了“大王八”三个字，被刑讯拷打，打得胳膊都抬不起来。毛羽丰因为一支枪的问题，也被单独传讯拷打一顿，打得腰背不能动弹。

有一天，会日语的李如芝去厕所，回来说：他不止一次地听到宪兵队长与沈阳宪兵队通电话，研究本溪的案件，可能要把我们转移到沈阳去。这个消息，又给大家精神上增添了负担。可是，很快又传出消息说，今后不再过堂（提审）了，让大家养好伤，伤养好就释放。当时，大家并不相信，可是此后敌人对囚室的看管确实放松了，也无人被提审了。接着，从宪兵方面传出一个离奇的消息：说这次案件之所以扩大，是由崔庆桂胡诌乱讲所造成的，罪责应由崔来承担。在一天下午，敌人进行公开审讯，将崔庆桂示众，审讯人员和县指导官（日人）唆使崔的属下教员肖梦潭、肖承朴等人当面打崔以泄愤，并叫大家去观看，一片吵闹喧嚣之声直达囚室。这些似乎证实了以前传言的可信。但是，我很奇怪，抓“思想犯”明明是日本人有目的、有计划的一种阴谋镇压知识分子的行动，为什么中途停止了昵？难道真的要草率收场了吗？当时，百思不得其解，只能等待事情的发展。

在我们于宪兵队囚禁过程中，许多后期被捕的人受过刑讯

后，一批批地陆续释放了。最后，有一天，看守兵对我们说：“你们的伤养好了，可以释放了。”其实，当时我们身上的伤还很重，只是从脸上看不出来而已。在释放我们那天，敌人还举行了一个奇怪的仪式。在一间房子里，我们先站成一个横排，然后敌宪兵队长领着几个地方官绅（其中有伪本溪县长王荫椿、伪农务会长崔××、士绅孟凌云等）进来。首先宪兵队长说：你们被检举，都是有罪的，经过审讯，罪证很确凿，但皇军宽大为怀，以日满协和为重。兼之地方官绅联合做保，特从宽处理，释放你们，你们要感谢皇军，今后要努力工作，以求立功赎罪。另外，你们必须牢牢记住，这里的情况及审讯受刑等，不许外传，对父母妻子也不准泄露。如果有人乱说，一定要抓回砍头，决不宽饶。接着，伪县长又按日宪兵队长的意思重复一遍，才释放我们，结束了我的二十多天的牢狱生活。我们的出狱，名义上是地方官绅保出来的，实际上是伪当局事先做好的圈套，以便下台。那几个保人我都不认识，当然也并不感激他们。

我被释放回家后，最初，一般亲友为避嫌疑，都不敢和我往来。到我家看望的只有2人，一个是我的学生石常惠，一个是我的堂弟朱光升。石与我有亲属关系并是同乡，当时他是本溪县公署参事官高木（日人）的秘书。一天晚上，他偷偷地到我家，告诉我他在高木的一个小日记上看到了我的名字，下面写着“要视查人”四个字，劝我言行要特别注意。这时我才知道，我是早就上了日本侵略者黑名单的人，怪不得被当做“思想犯”而被捕入狱。朱光升当时是县警察训练所的警兵，他来看我时，问我：“你知道你们为什么释放得这么快吗？你们被释放，完全是警察教练所教官常伯英的力量。”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说：“你们被捕后，常感到不安，他是一位有抗日思想的人。后来被捕的人多了，他不敢在家住，夜间就躲藏在后山妓馆里。

有一天半夜，他回到教练所，伪传命令说是欢喜岭出现股匪，奉命立即出发剿匪。他带领全副武装的四五十警兵，连夜出发，走到欢喜岭，天已拂晓，这时他便正式宣布：今天不是剿匪，是领你们造反。大家都知道，本溪近几天抓了很多，我们不能等着死，现在我领着你们到东边去投奔抗日义勇军。讲完，指派十来个亲信警兵断后，我也在内（朱光升自称），继续前进。可是人心不齐，逃跑者不断出现。他们手中都有武器，断后者也不敢阻拦。走到小市时，只剩下十来个人了。这时，我也乘机跑回来，最后常只带几名亲信去东边了。”听完，我明白了，就是常伯英的率众起义投奔抗联的事件，使日本侵略者震惊，他们害怕压迫过甚，激起民变，所以本溪宪兵队与沈阳宪兵队反复电话联系，研究对策，才决定迅速结案，释放人犯。

以“思想犯”罪名被日本侵略者抓去的人大都释放了，但崔庆桂始终没能出狱，一直被押到秋季，还陪过几次绑，后来不知所终。有的说他被送到连山关日军宪兵队杀害了，有的说是被喂狼狗了。他的罪名是心术不正，诬陷好人，欺骗皇军。这个罪名是硬加在他头上的，实则他才是真正被诬陷被欺骗者呢。当然他在受审时挺刑不过，乱咬了本校教员，也是不对的。

这次本溪“思想犯”案件，虽然只死了一个人，但轰动很大，远近皆知。当年夏，我赴沈阳，在火车上遇见安东省伪教育厅科长荆百斛和安东林科中学校长秦有德。他们问及此案，我简略谈谈。荆说：“安奉线（即现沈丹线）是日满的通路，也是日本的生命线，不把这条路线的人镇压伏贴，他们是不安心的。你们这次幸免于难，将来恐怕还会有类似的案件发生。”果然，就在这年秋冬之交，“安东事件”发生。也是以“思想犯”的罪名，大抓知识分子，被抓的大都是教育界人士。当时安东是一个省，管辖许多县，各县有许多人被日伪逮捕，规模之大，被

捕者之多，远非本溪可比。至于结案处理，更与本溪不同。被捕人员有的被杀害，有的被判刑。秦有德被敌人杀害，荆百斛被判12年徒刑。另外，我的同学马福双、兰兆环在通化师范学校当教员也被捕了，结果如何不详。该案结束后，安东省所属各市县的中小学教员奇缺，次年（1937年）春，安东省竟在报上登广告招聘教员，可见该案灾难之重了。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件小事：

1937年春，在《安东日报》登载招聘小学教员时，有一同学刘凤训（梨树县人）特地到本溪来约我一齐去安东应征。我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安东事件”已过，那里不会再大抓思想犯了。奉天省（现辽宁省的一部分）可说不定。我们到安东省去是“避危求安”，是明哲保身的办法。我因家室之累太重，没有同意。后来，他是否到安东去，我就知道了。从这件小事中可见当时的知识分子在日本殖民主义统治下的悲惨处境了！

以上事情是48年前的往事，是我亲身的经历。回忆当年当亡国奴的悲惨遭遇，对比起今天的幸福生活，越发激起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强烈心情，同时也越发感到加速四化建设，充实国力，抵御外来侵略的重要了。

（摘自《本溪文史资料》第一辑）

黑山师中校事件

周 俭

“黑山师中校”即伪满黑山初级中学，地处“关马井”西

侧。当时，学校挂两个校牌，一是“黑山初级中学”，一是“黑山师范讲习所”，“黑山师中校”是统一简称。事件发生那天，学校正在上课，前前后后，一清二楚，其经过是：

伪满康德3年（1936年）3月中旬，黑山师中校正式开学上课，同学们都怀着喜悦心情来到学校。我是一年新生，因教室未修完暂在食堂上课。开学后第三天早晨刚上一节课时，忽听汽车怪叫几声，刹时把全班同学的注意力吸引到窗外。当时，有两辆大卡车开进校庭，车上载着全副武装的警察，约20多人。卡车刚停，他们就气势汹汹地跳下车把校门紧闭，并奔向各教室。到我们教室的一个日本人，手持战刀，紧跟在后面的一个警察面对教室凶狠地喊叫：“这是几年级？班长是谁？快出来！”是时，全班同学都吓呆了，班主任赵尊谦老师面色苍白地说：“班长快出去。”我刚到门口，日本人哪噜一阵，翻译就问：“你们上几天课了？”我说：“只上三天课。”又问：“为什么在食堂上课？”我说：“教室没修完呢。”这时翻译跟日本人又哪噜一阵才让我回屋。当他们离开教室，我抬头往外看时，汽车上绑着不少同学，而且语文老师李晓峰也被绑在车上，不久汽车就开走了。

当天下午我逃回白厂门村大康屯。惟恐不安全，又躲避到钟家沟姑母家。过了17天学校派人找我，到校后，传说二年级以上正副班长有共产党员嫌疑，李晓峰老师是发起人。另外还有教育局长张仰山等都是同案，一起被逮捕了。

事过两个月之后下来通知，说张局长的灵柩明日送回。师生闻此噩讯，无不为之垂泣。翌日清晨师生齐集南门外等候，果见一辆卡车载着黑棺材，停到南门外。当时简单的吊祭一下，王作宾老师读悼词，全体师生泪如雨下！

目睹日本侵略者伙同汉奸对无辜师生所犯罪行，我当时深

感悲愤。

(摘自《黑山县文史资料》第一辑)

“仰山事件”真相

赵昆刚 王荣升整理

“仰山事件”是在日本侵略者蓄意制造“九·一八”事变后的1936年，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治安肃正”“三年计划大纲”，妄图三年内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消灭一切抗日力量的前提下发生的。由于日本关东军的部署，相继在满洲国进行全面秘密肃正，黑山“仰山事件”就是日本关东军所属的军警宪特们奉行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对中国知识分子残酷关、杀、镇压政策的真实写照。伪大虎山宪兵特务段××(原三道境子教师)、特务傅景山(教师)和黑山县共荣旅情经理刘××为了泄私愤，趁机合谋密告伪教育局长张仰山等人是“赤化分子”在黑山的代理人；于是伪当局在黑山地区内逮捕了一批无辜的知识分子。这样，一场有预谋的黑山教育界大惨案——“仰山事件”爆发了。

1936年3月某日清晨，黑山县警察署门前架着机枪，街头巷尾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守备队，街头上路新犬稀，家家关门闭户，人人藏躲不敢喘息；日军捕人的汽车，在街上狂风猛撞和守备队急促的皮靴声混杂在一起，震撼着黑山全城。黑山教育局长张纯景(字仰山)，就在这种恐怖下，以“赤化分子”、“共产党员”、“反满抗日救国会黑山分会会长”的莫须有罪名被捕了。是日相继被捕的有：黑山中学校长孙尚海(字冠彬)、语文

教师李遇春（字晓峰）、教育局学务股长张鹤年（字锡龄）等人，被送到大虎山日本宪兵队。事隔两天的深夜，又有大虎山宪兵队的警车开到黑山，逮捕了黑山基督教堂牧师孙益三、仁济医院大夫赵景三、县署财务科长杨振安、基督教徒（女中教员）孙文元、县教育局夫役李忠贤，以及黑山中学学生张宝奇、陈品新、齐维良、李执忠、徐克谦、曹文永、汤维明、李绍武、张桂棠、徐显华等多人。其中张纯景、孙尚海、李遇春、张鹤年系所谓“赤化”重要人物，被关在大虎山宪兵队受严刑审讯。敌人使用一切残酷手段，如灌凉水、打棒子、坐老虎凳等都没逼出口供来。三四天后把张纯景、张鹤年等押送锦州宪兵队。其余被抓捕的教师、医生及部分学生，经审讯后释放了。

大惨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又有日本宪兵特务，带着4名警察到教育局办公室搜查张纯景的“赤化材料、进步书籍”及所谓的“共产党”文件，他们把办公室的砖地刨开，但一无所获。之后又到学务股长张鹤年家搜查，吓得张鹤年的老母惊慌万状一病不起，恹恹成疾。

当时黑山全城，戒备森严，十步一岗，五步一哨，日本便衣特务、中国的汉奸匪子，不时出没县署、民宅，人人战战兢兢提心吊胆，时刻担心有被抓捕的危险。

张纯景、孙尚海、张鹤年、李晓峰等被押到锦州宪兵队，关在牢房隔离审讯。日本宪兵特务利用各种残暴手段，施以各种严刑逼供。张纯景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死去活来；忍刑不过，屈打成招，竟胡说起来：“我是共产党员……（其实不是。）”最后含恨死于锦州宪兵队的牢房里。

张鹤年被捕后，带上了手铐脚镣，敌人施以酷刑灌凉水，被灌得肺胀腹肿，连身上的毛孔都浸出水珠，但张刚毅坚定，什么口供也没有供认。孙尚海在锦州宪兵队的刑审大狱里，被日

本宪兵摔在砖地上，四个特务“踢皮球”，踢得他在地翻滚跌爬，深夜在昏迷之中被送到日伪的特设救护医院。当孙尚海清醒时得知：张局长刑伤惨重，含冤已死。而且张在没死之前，日本特高课掌刑者，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身上皮肤好像鲛叶一般，最后将他装进麻袋里，几个特务抬起来往砖地上摔，疼得他呼叫不止，在昏迷中胡说一气，屈打成招。张纯景生前关在囚牢里，哀痛地大声疾呼：“我太冤屈了！是谁这样地陷害我呀！”并喊着：“我死后做个冤屈鬼也得报仇呀！”张纯景局长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大惨案幸存者孙尚海说：“我在囚牢里被提出来，这次不是行刑审讯，而是利用精神恐怖的手段，逼我认供。”原来，日本宪兵特务把他拉到活杀中国人的现场让他看。第一场是杀人活剧。事先把训练好的吞噬中国人成性的日本狼犬放出来，扑向绑在狼狗圈桩板上的中国人，顿时撕开皮肉，扒出五脏六腑，鲜血淋漓地被这些恶犬吞噬着，被吃的所谓满洲犯人痛楚万状，颤抖四肢死去。

第二场杀人活剧更是惨不忍睹。把活人作射击靶子，让几十名新征调来的日本青年小鬼子，练习射击，把几个活生生的中国活人靶子穿得满身弹孔，有的揭开脑壳，有的炸烂胸膛，有的打断双腿，有的没被射死，还在无力呻吟……是可忍，孰不可忍！看后，日本特务凶狠狠地对孙说，“你的！赤化分子！承认的！”“不说的，他们的一样！”孙尚海一时呆若木鸡，三次昏倒在地，被日本宪兵提撑着……

孙尚海在锦州日伪特设救护医院时，亲耳闻他的学生孟昭明（是这所医院唯一的中国护理医生）说：“这所医院明则是救护刑重的犯人，实为解剖活人的场所。近来有几名满洲犯人，用来作解剖手术，作日本医生搞人体解剖的实验，把活生生的中

国人剖腹、切头、剥皮、开膛、一直拿出心肺，人也就停止呼吸了。”还说：“解剖活人都是日本医生干的，不让我参加，这都是我收拾尸骸时得知的。进这所医院能幸免一死真是百里逃一呀！”

黑山中学教员李晓峰被押解到锦州宪兵队后，经数次刑审，身遭种种酷刑，遍体鳞伤，目不忍睹。敌人用火箸（筷子）灼烙胸部与肋间，还用香火熏烧腋下，最后忍刑不过，胡说一通，在严刑逼供下，承认自己曾散布过不满日满亲善的言论，做过“赤化”的演说……后来，被关进锦州大狱，在服刑中死去。

无辜的师中学生李绍武等十几人被送进大虎山宪兵队，也身遭酷刑。他们有的五指缝间夹笔杆，敌人用力紧握，疼得他们哭叫起来；有的双手举椅子，折腾他们；有的打杠子，打嘴巴，口角流血；有的威逼恫吓，被吓得目瞪口呆，精神失常。但谁也没有承认口供。对于抓捕的学生都是经过单独刑讯，直到4月末，家长写来保证书，才被释放出来复学。

此外还有无辜受害者，黑山基督教徒、仁济医院大夫赵景三，经大虎山宪兵队的非刑拷供后，抬回家不久死去。

黑山教育大惨案——“仰山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蓄谋炮制的一场大冤案，是日本侵略者与汉奸特务勾结，恶意编造所谓“赤化分子”、“共产党员”名单，在黑山文化知识界搞什么“治安肃正”的一次镇压活动。这场大冤案、大假案波及县署要员及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学生等各方面人士，恐怖笼罩着黑山县城，轰动辽西各地，震惊奉、吉各省。真是骇人听闻，惨不忍睹。

黑山教育大惨案，亘时两个月之久，惨遭非法刑审的无辜者达20多人，其中受严刑逼供而惨死者3人（张纯景、赵景三、李遇春）。间接惊悸成疾死亡者1人，即张鹤年之母，子被捕母

惊悸成疾，子归而母绝。遇难者家属被惊吓中疯症者2人，即张纯景之妻、孙尚海之妻患精神分裂症，疯癫不语，失去常态。惨遭酷刑身患残疾者3人，有张鹤年，刑后患肺部水瘤症，孙尚海因脑震荡患高血压症，教育局夫役李忠贤，久囚阴湿牢狱，患疝气病。其他被捕人等幸免伤亡。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欺世盗名，掩人耳目，他们居心叵测地装出一副假仁假义嘴脸，以惑群众。如黑山教育局张纯景含冤之死，以棺衾收殓尸体，遣灵柩运回黑山，并令县署副参事官美浓丰吉率县署公职人员及中小学校师生千余人列队出城接灵，并派礼教股长李某与科员高某陪同死者妻属护灵返黑山。接灵人等敬立城外公路两侧，垂首默哀，以示悼念。

“仰山事件”发生后，黑山各界人民无不发指，痛斥日本侵略者的血腥罪行。中国人民同仇敌忾，义愤填膺，更加坚定抗日必胜的信心。

（摘自《黑山县文史资料》第一辑）